

储道立 熊剑平 / 著

中国
古代

情报史

论稿

根据《左传·哀公

元年》记载，我国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情报专家就是夏朝少康时代的女艾：「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但事实上，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各部落、氏族在相互交战过程中，情报就已成为为了双方进攻和防御的重要谋略和手段，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情报学实践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储道立 熊剑平 / 著

中国
古代
情报史

论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储道立,熊剑平著——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27-04642-0

I. ①中… II. ①储…②熊… III. ①军事-情报学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109号

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

储道立 熊剑平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毕彦华

封面设计 赵 倩

责任印刷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375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6071

字数: 220千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624-0/E·3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曾呼吁重视各种专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若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是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其后，梁启超超凡卓绝的识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时至今日，各种专门史层出不穷，似乎正沿着梁启超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显然，在社会分工越来越具体、学科门类越来越趋于专门化的大趋势之下，专门史确实更能满足社会及相关教学工作之急需，同时也不失为通史和史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或是必要之补充。

任何一门学科在建设过程中，都免不了需要对既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阐发，以求得扬弃。可惜的是，据我们了解，在相关情报学学科之中，一直没有一部专史面世，甚至在教学科研中也缺少史学之应有地位。可以说，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建设一部满足基本教学之需的情报史实已显得刻不容缓。

本书主要部分是我的老师储道立先生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所撰文稿。其中有一些虽由我执笔写就，实则也与储师耳提面命直接相关。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少数未经发表的文字（多为人物论稿），则是我沿着储师指示方向涂鸦而成。之所以攒集在一起，是希望对相关研究领域有兴趣的同志能从多个方向进行努力，既研究思想理论，又关注人物事件，以尽快推出一部完整而成熟的情报史专著。拙著倘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之功效，对相关学科建设起到一点推动或启示意义，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既是多年积累，时间跨度也长，故而不可避免

地会在文章体例上稍有不同。比如就注释来说，有的文章是因为当初所刊载杂志不强调注释，大量删减作者原有注释所致，这次编订过程中曾想一一补齐，但终因查检不便，只得保留旧貌。这是需要对读者诸君说一声抱歉的。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其中有的篇章因为与相关学科有密切的姻亲关系，多少对情报史编撰工作具有启示意义，故此也一并收入进来，望能察之。

本书能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庆安公司刘亚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同时也感谢出版社和编辑同志的辛劳。我的同学马彦为此书出版不倦奔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熊剑平于品园

2009年10月5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通览
017	论《周易》情报思想
030	孙子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
052	《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述评
066	《管子·八观》的军事情报思想
074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及启示
081	《六韬》军事情报思想
093	《吕氏春秋》军事情报思想
107	《吕氏春秋》情报思想的产生
115	《李卫公问对》在军事情报思想史上的意义
124	戚继光的军事情报思想
135	曾国藩的军事情报思想
144	《间书》述评
158	日本对《孙子·用间》的研究和运用
165	《三十六计》发微
188	唇语判读
197	女艾行间考

伊尹行间考	208
吕尚行间考	218
武官溯源	227
向戌弭兵述评	232
我国最早的特种作战部队	244
外交家子贡	247
勾践情报活动述略	269
苏秦间谍案述评	280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	292
汉丞相陈平的情报活动	299
北齐名将韦孝宽的情报活动	308
善于利用商贸获取情报的裴矩	316



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通览

军事情报思想是军事情报实践的理性认识。在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军事情报思想，既是对当时军政外交等实践中情报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前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军事情报思想史。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军事情报思想产生、发展及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涉及到情报哲学、地位作用、手段方法、分析处理、组织分工、政策纪律、人员素质等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隶属军事历史科学范畴，是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军事思想的历史遗产之一，又对当代及今后的军事情报实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远在商代时，伴随人们预知未来的渴望，军事情报意识即已萌生于宗教神学活动之中。甲骨卜辞中已有侦察敌情和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记录。周代则是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发轫期。《周易》中有许多直接叙述战争和情报预测的卦爻辞，反映了作者古朴的军事情报思想。“观”卦就掌握各部族邦国情况的问题，否定了幼稚简单的“童观”和局部片面的“窥观”，主张既要“观我生”，又要“观其生”，还要考察大国的政绩（“观国之光”），以此决定自己的进退方针和内政外交方略。这一思想实则是孙子“知彼知己”情报观的渊源。在“师”卦中，作者提出了“师出以律，否臧凶”的命题，认为掌握一支部队出征时的状况是否良好这一情报，可以预见战争的吉凶。在“同人”卦中，作者指出“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预言在隐蔽行动中如果暴露了目标，不仅要打

败仗，而且该部队将多年不能恢复战斗力。在“复”卦中，作者认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某种敌对势力的崛起而贸然用兵，将导致“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的恶果。这些朴素的认识，反映了《周易》注重预见的军事情报意识。

其后，《易传》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几”说。《易传》认为，战争胜负、宫廷政变、人事吉凶等社会现象的变化是事物刚柔阴阳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并把导致这种变化的初始迹象和征兆称为“几”。为此，《易传》强调“早辨”、“知几”，要求人们“见机而作”、“极深而研几”。“知几”说，不仅是《易传》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关于情报获取和预警思想的精髓。在《易传》看来，情报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原始要终”，“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意即：察其始而求其终，在复杂隐晦的现象中探索真相，获取机密，推断未来趋势，从而判定事物的吉凶，促成人事的努力。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军事思想成为百家争鸣的论题之一。《老子》在哲学上主张柔弱胜刚强，初步认识到事物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的规律，进而提出“知常曰明”、“未兆易谋”、“知雄守雌”、“大巧若拙”等观点，对后代的情报与谋略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墨子》政治上主张非攻，军事上专讲防御，并在守城术的研究中叙述了侦察和防谍措施，具体实用，操作性强。《荀子》提倡仁人之兵。在情报保障方面，认为“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只有如此，才能做到“聪明警戒”。在情报获取与分析方面，要求“观敌窥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强调搜集动向情况，采用秘密深入的手段，注重反复分析验证。在作战指挥方面，提出了“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的情报使用原则，并将其视之为将帅的“六术”之一。

先秦诸子中，以《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的情报思想较为丰富。《管子》把情报分为“形”、“能”、“意”三大范畴，

认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见解独特。它把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归纳为经济财力、武器装备、军队建设、掌握敌情和捕捉战机等八种因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之间存在一种逐级追加的关系，并把“遍知天下”、“明于机数”的情报工作视为战争准备和决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道出了情报工作与其他各项军事工作的关系及其重要地位。在战略情报和基本情况的侦察和搜集方面，《管子·八观》提出了八大任务，既有军事方面的内容，又包括自然资源、农业生产、民风教化、统治集团和国君意志、外交结盟诸方面，不仅在情报工作指导方面具有任务明确、要求具体的特点，而且在分析和预测方面贯穿着古朴的方法论。这种全方位的情报调研思想，是战国时代对情报任务的纲领性的表述。在防奸保密方面，作者以别开生面的叙述，揭示了唇语判读法的语言学原理。

《鬼谷子》以外交和游说工作中洞察君主的内心世界为核心，显示了独特的情报工作思路。基于“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的认识，以及言语为思想情感的门户这一基本观点，主张通过言谈技巧叩问对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以达到“测深探情”的目的。为此作者细致论述了一套旁敲侧击、分析判断、引诱说服的揣摩术，开启了情报心理研究的先河。此外，《鬼谷子》的理论还与纵横家有密切的联系。《鬼谷子》善于雄辩，独立应对，力求把握他国最高机密，谋求以外交战线配合军事斗争，是其所长，但也由此蒙上了崇尚诈谖、追求游说者个人功利的弊端。

《吕氏春秋》探讨了不少情报基础理论。关于情报的性质地位，作者用“智”揭示了情报工作的本质特征，并认为“义”、“智”、“勇”是赢得战争的三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它视情报为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必须凭借的“因”，从而主张“贵因”，认为“因则无敌”。关于情报工作的任务，它继承了《易传》的“知几论”，着眼于“先识”、“知化”、“长见”，把高度的预见性和有效的预警视为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根本要求，并以此作为区分明君和

惑主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吕氏春秋》进而探讨了情报工作的规律——“知道”。认为有效的情报工作必须“察微”、“审征表”、“明倒顺”;国君和统帅在听取情报时,主观上必须“去囿”、“防壅塞”,客观上必须“察传”、“察疑”;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重言”。

春秋以降,兵家蜂起,军事情报思想走向成熟,其标志是《孙子兵法》。宋朝时期,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被定为“武经”,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情报理论。

《孙子兵法》以“知”为核心,以预见战争胜负为根本目的,建立了系统的军事情报理论。在情报哲学方面,孙子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既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和机械的数量推理方法,而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作战指导原则上,他主张“先为不可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认为作战必须以对敌我双方情况的透彻分析为基础。为此,他赋予战略情报分析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建立起实质是战略情报分析的“庙算”理论,同时,将“庙算”与“诡道用兵”视为百战不殆的两大基本保证,从而奠定了传统兵学先计后战、谋略用兵的特点。孙子的情报观是“彼己”、“天地”一体化的大情报观。在这两对基本范畴之下,又以“道”、“天”、“地”、“将”、“法”为主要内容,按性质和类别划分了不同层级的情报分析项目,既有战略层次的情报,也有战场、战术层次的情报,涉及政治经济、君将关系、军队建设、国防力量、后勤保障、法令法规、兵器装备、战场环境、战术地形诸方面。在工作流程上,他把“庙算”分为逐项分析、对比研究、综合评估三个阶段,并认为情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战争胜负,而且取决于情报工作者能否多算细算。在方法论上,他建立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逻辑分析模式,且已具有定量的成分。在“用间”方面,孙子全面论述了谍报工作,举凡地位作用、招募派遣、任务纪律、政策待

遇、性质类别、经营指导、人员素质、历史经验，均有讨论。孙子的“用间”思想奠定了谍报学的理论框架，既是上古人力情报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反映了古代兵学思想由“仁本”向“尚智”的巨大变革。在战场侦察方面，他认为“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重视细微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试图揭示现象与本质的联系。为此，他总结了三十多种“相敌”之法，注重对敌情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判断，反映了军事思维的某些特征。

《孙臆兵法》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主张针对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认为“王者之将”必备的条件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则诤。”它把“不用间”列为五种“恒不胜”之一。这些都反映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

《吴子》的情报思想特色，首先重视对宏观态势和各诸侯国作战特点的调研。《料敌》篇对魏国周边环境所做的分析，是一篇开启国际战略环境研究和周边安全形势分析的示范之作，与《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纵横家的风格。其次，在认识论上，它看到了事物显与隐、内与外、进与止的关系，主张“以见占隐，以往察来”，做到“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再次，它创立了“四机”说，认为作战需要掌握敌将的能力气质、战场的军事地形、敌国的君臣人事、敌军的作战力量，四者之中，尤以“占其将而察其才”为要。最后，在情报的应用上，它强调“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并为此规定了依据敌情决定是否与敌作战的十四条战术原则。

《司马法》是军事思想由“以仁为本”向“兵以诈立”过渡的转型期的代表作，有关军事情报的论述多为格言式观点，未能展开论述。在战争观上，它在强调“仁见亲”、“义见说”的同时，又认为“智见恃”，看到了战争对识见的依赖。在情报思想方面，它提出“方虑极物”的观点，认为“顺天、阜财、怗众、利地、右兵”是作战需要同时考虑的五件事。在情报运用上，它指出：

“凡战，间远、观迹。”并着眼于“因敌令阵”、“视敌而举”，提出了一些属于战场监视范围的“刃上察”的要求。

《尉繚子》基于人事重于天命的观念，在战争决策上重视人的思考能力，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强调“兵胜于朝廷”，要求做到“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在作战指导上，重视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以确保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它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也。”

《六韬》提出了一条独特的情报工作思想路线。与《孙子兵法》侧重于秘密战线通过“用间”了解敌情不同，它主张“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使全部情报及分析结果辐辏于君主一人之身，从而做到对外部世界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在诸侯各自为政、侦察通讯手段落后的时代，虽然无法实际做到“无所不知”，但是这种“以天下之耳目视听”的情报路线反映了情报工作的理想境界，并成为历代情报部门的奋斗目标。《六韬》认为情报工作的任务包括“三观”、“六见”。“三观”是对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了解。“六见”要求透过表象分析真实意图，掌握他国军政首脑的实际战争意图和作战策略。《六韬》还首次阐述了司令部机构的参谋人员组成，其中对“游士”、“耳目”等情报类参谋人员的组织建制和职掌分工做了明确的规定，较之《周礼》中的情报官员设置，人员类别和职责任务完备得多。在《文伐》和《三疑》两篇，作者又专门论列了种种收买利诱、要挟控制敌方官吏将帅的手法，意在借此达到离间君臣、收买内奸、获取情报的目的。这些间谍阴谋手段，被后人称为“阴刻陷人”的伎俩。在情报传递方面，《六韬》介绍了阴符和阴书。这是原始的通信联络方法，前者是秘密传达军令的凭证，后者相当于机密文件，用于“其事繁，符不能明”之时，可以传递较多的信息。为了情报的准确理解和安全保密，《六韬》还对阴符、阴书的规格、

形制、功用和发送方法做了规定。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统一与分裂局面更迭出现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基本处于农耕水平，致使军事科技直至明朝末期也未能实现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彻底变革，虽然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军队的构成也有所改观，但并未带来战略战术的质的飞跃，古典军事思想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军事情报思想已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绚烂多彩，而是趋于平淡，继承多而创新少。虽然情报实践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泛，却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建树。汉代，为了加强边防，拓展疆域，朝廷曾先后派遣张骞和班超等人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借以了解匈奴等游牧部族的情况及山川道里形势，虽然他们取得了重要成就，却未能在情报理论上留下著述。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对联合与打击的对象、内外政策提出了建议，准确地预见了尔后的天下三分的局面，是战略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杰作。从战略情报文件整理的发展演变看，《隆中对》与《吴子》中对战国七雄的分析模式和《战国策》中有关战略态势分析的大量篇章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隆中对》虽然分析较《吴子》深刻，也克服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夸张铺陈之弊，但毕竟是一篇对策研究，而非战略情报整编的理论文字。其后，虽然历代均有类似《隆中对》的文献，可惜终未总结出有关战略情报分析整理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东汉末年，王符的《潜夫论》对“救边”、“实边”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主要是谈政治而不是军事。唐代以后，边防乃至海防情报工作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相应出现了若干论述，但也大抵归于具体情况分析和措施对策的探讨，而没有上升到有关边防情报工作和周边环境的情报理论上来。宋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虽然设有“料敌”、“用间”、“审察”等门类，但也仅限于史实的排比爬疏，而无理论的归纳。明代特务统治猖獗，组织机构庞大，虽则不足为训，但是除了道德尺度的评价之外，也未见有专就政治情报和对内侦控问题本身进行

总结的专业论述。

随着军事思想的缓慢发展，“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成为传统兵学的基本特征。军事情报思想也基本沿着祖述孙子的轨迹前进。汉代末年，曹操阅读了大量的兵书战策，认为孙子的著作最为深刻，撰写了《孙子注》，从而开启了后代诠释、研究《孙子兵法》的学术风气。宋代汇辑并刊行了《十一家注孙子》，集中反映了《孙子兵法》诠释派的研究心得。在情报思想方面，诸家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不注重字词的考释，而着意于军事斗争、思想意义以及具体问题的探讨；二是联系实际，每每援引战例和间谍案例加以印证；三是在《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引申发挥，深化认识。他们或论证情报工作的性质意义、地位作用，或界定情报术语、揭示概念内涵，或扩展手段、充实做法，或增加类别、补充细则，或探讨旧案例、引出新问题。虽然彼此之间观点不完全一致，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孙子兵法》的情报范畴，却反映了众多兵家乃至政论家对军事情报理论和实践的重视甚至是重新审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古典军事情报思想，并使之更趋具体实用。

诠释派之外，也有论者对《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提出质疑，其中集中反映在谍报工作方面。除了儒家出于“道德立场”的迂腐之见，以宋代苏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苏洵认为：“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谋，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智于此，不足恃也。”质疑者的这一观点，指出了孙子谍报思想的“知用间之利而不知其害”的缺陷。

汉代的《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四库提要》说该书“务在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在情报侦察方向上，首先，《三略》注重从“粮食”判断敌情。它说：“用兵之要，

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虑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敌。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其次，《三略》提出了“因敌转化”、“动辄随敌”的情报与战术应用相结合的思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再次，要求将帅“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除此之外，还要做到“能受谏”、“能采言”，举凡“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都应听取，实际上已经将“知情”和“采言”作为衡量将帅情报工作水平的两个标准。

《将苑》系托名诸葛亮之作，专论将领应具有的品质，内容多复述《孙子兵法》，也有一定创意。它以“将器”的大小区分带兵能力，认为“天下之将”应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为此，身边“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同时要分析间谍和侦察人员的报告，“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值得一提的是，《将苑》专门叙述了四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作战特点及地理环境，是对周边民族基本情况及作战特点进行专题调研的雏形。

唐代将领李靖著有《李卫公问对》和《李卫公兵法》，前者为“武经七书”之一，后者今有辑佚本。李靖谍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用间最为下策”，而更加倚重从公开渠道搜集“蕃情”。他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反映了慎用间谍的思想，与宋代苏洵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在间谍的招募上，他主张“因邑人”、“因仕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与《孙子兵法》的“五间”相表里。在经营对象上，他总结历史经验，归纳为“间君”、“间亲”、“间能”、“间助”、“间邻好”、“间左右”、“间纵横”数种，比前人有所发展。他在

辩驳自己是否以出使突厥的大臣唐俭为死间的问题时，提出“去大恶不顾小义”的观点，这与谍报史中经常论及的“郑武公杀大臣以伐胡”的案例有共同之处，触及到了谍报伦理问题。在军事情报基础理论方面，李靖既重视“知敌”，更强调“误敌”，与唐太宗“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的认识相一致，进入了谋略欺骗和情报战的领域。关于情报应用，李靖侧重强调情报对于奇正用兵和掌握作战主动权的保障作用。此外，李靖还谈到以驿站作为情报传递和联络据点的问题。

唐代李筌曾注释《孙子兵法》，并积十年心血撰成《太白阴经》，篇帙宏大，秋毫必录。其中《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庙算》、《沉谋》、《行人》、《鉴才》诸篇，详细论述了有关军事情报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对孙子的情报思想作了全面的引申发挥，在古典军事情报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筌情报思想的特色在于人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探心之术”。他主张“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根据人性仁义忠信、智勇贪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交谈方式套取情报。其核心思想是“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鬼谷子》的揣摩术，而且在情报心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李筌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确认战守全在人为，与天时阴阳无关，另一方面，却又在其著作中充斥了大量的占星望气、遁甲六壬等内容，认为通过天象灾变的考察可以推断战争与人事吉凶。这是对《六韬》中“观云望气”以测敌军的唯心主义情报观的恶性发展，反映了传统兵学受到阴阳术数严重侵蚀的一面。

北宋时期，许洞推崇孙子和李筌，著《虎铃经》20卷。许洞认为：“用兵之要，先谋为本。”基于此，书中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情报问题，大体上是“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在谍报工作方面，他综合孙子和李靖的用间理论，提出“用间八术”，增设了“使者”、“内嬖”、“谗人”等经营对象，有所创新。但是，